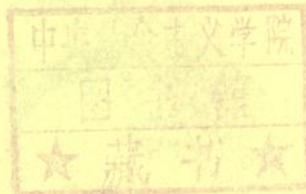


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

论文选

郭化先选



A841.63/9

DG/19/12 51720

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

讨论会论文选

中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筹备组常设小组编



200016589



广西人民出版社

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 讨论会论文选

中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筹备组常设小组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13.25印张 插页2 331千字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400册

书号：2113·21 定价：1.60元

DG 19/12

编 者 的 话

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至十五日在桂林召开了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广西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北京大学哲学系、武汉大学哲学系、湘潭大学、广西师范学院、《哲学研究》编辑部共同发起召开的。会议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及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指导作用，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方向、方针和方法，交流了经验和学术成果，大大鼓舞了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动性、积极性。

会议领导小组根据与会代表们的要求，决定将会议收到的学术论文和大会发言稿选编成册，交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期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有所促进和帮助。会议结束后，中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筹备组常设小组受托决定由下列五位同志（按姓氏笔划为序）：孙克信、宋一秀、杨春贵、苏厚重、林伯野组成编辑小组，具体负责对桂林会议上初选的论文进行修改、审定工作。

这本《论文选》，大体上是按照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总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的顺序编排的。这些论文分别就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特点、研究方法，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等问题，阐明了各自的见解，部分地反映了我国近几年

来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成果。其中有些问题或观点，理论界、哲学界是有分歧和不同意见的，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探讨。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我们在编选工作中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二年三月于北京

目 录

希望和意见

- 1981年10月8日在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 吴江(1)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 1981年10月9日在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 韩树英(11)

从历史决议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

- 1981年10月12日在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 梁育之(36)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是怎样教导我们学哲学的?

- 1981年10月12日在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 温济泽(68)

关于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几个问题

- 孙克信 苏厚重(83)

简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宋一秀 许全兴(96)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

- 刘纲纪 雍 涛

陈祖华 李南熏(115)

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 陈战难(123)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范 阳(136)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主要贡献 雍 涛(147)

论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特点	潘宝卿(159)
《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冯国瑞(172)
伟大的认识工具	
—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认识论思想	卢国英 叶佐英(186)
略论自觉能动性的作用	
—学习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一点体会	钟克钊(203)
论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康绍周(215)
《矛盾论》的历史地位	杨春贵(228)
论诸矛盾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	杨超(247)
论“矛盾必分主次方面”原理的科学性和毛泽东对它的贡献	金守庚(265)
对立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相对和绝对的辩证统一	李存立(279)
毛泽东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初探	刘廷亚(286)
毛泽东军事著作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中的地位	林伯野(299)
战争中的辩证法	
—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一点体会	
.....陈葆华 张文儒(313)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军事唯物辩证法思想初探	胡子宗(337)
毛泽东同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贡献	曹广胜(353)
毛泽东同志的唯物史观初探	李南熏(382)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门科学	
—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秦向阳(394)
试论毛泽东同志关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原理	
.....赵松林(406)	

希望和意见

——一九八一年十月八日在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

吴江

全国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据我所知，在我国还是第一次。仅此一点，就很有意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刚刚做出，开会的时机也选择得很好。《决议》重申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要坚持，就得学习好，研究好。但要做到这一点也并不那么容易。

据一位驻中国的日本记者说，现在坚持毛泽东思想，“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比文化革命时代或文化革命前更大的困难”，“恢复毛泽东思想运动的前途是多难的”，因为“中国国民的认识和时代完全变了”。这位日本记者对于坚持毛泽东思想是悲观论者，这也难怪，因为他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也不懂得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也有人说，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毛泽东思想还有马列主义味道；五十年代以后，毛泽东思想就逐渐黯然无光了，现在已经不值得再提了。这也是不懂得什么叫毛泽东思想，是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混

滑起来所致。这也是一种悲观论，或者叫否定论。不过这种论调在我们队伍中是极少数。

我们在座的大概都是乐观论者，是有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信念的。但确也碰到一些困难和认识上的分歧。因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造者和解释者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中国的革命事业因此遭受了挫折。现在有的同志一谈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对于《实践论》、《矛盾论》中的有些论点可不可以商讨？当然可以商讨。党中央重申四项基本原则，最近又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我们不能把这些和解放思想、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对立起来。提出前者，并不是说后者已经失效。但我们确实也应该注意：双百方针不是自由化方针，解放思想也不是说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指导。从实际出发，任何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可以商榷，都应该商讨。《哥达纲领批判》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描写，有些是需要商讨的。《共产党宣言》提出“工人无祖国”，早已有人在那里商讨了。那末，《实践论》、《矛盾论》中有些提法为什么不可以商讨呢？我们去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商讨。有一位同志说得对：我们不能象孔老夫子那样“述而不作”。其实，孔老夫子自己也并没有执行这一条，他对先王古圣的东西是作了大量的删改的。

但是，我以为，商讨要有正确的态度，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要散布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的怀疑，不要动摇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信念。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增强信心的问题。从三中全会到今天，我们的大章程、大章法已经有了，现在主要是落实的问题，贯彻执行的问题。这里就碰到一个信心问题，有些人的信心不那么足，甚至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东西，也有不适当的挑剔态度，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列宁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开始急于废除商品货币，很吃了一些苦头，但列宁并没有因此把《哥

达纲领批判》拿来批一頓，说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不可靠的，是“左倾的根源”等等。马克思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是根据工人阶级已占人口多数的国家的情况。列宁在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搞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因为工人阶级占人口的少数而抛弃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或者嘲笑、挖苦马克思，而是肯定它，同时给它以补充和发展，特别提出了“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这样一个著名的原理，事实证明，我们有些同志至今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就是说，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我以为，我们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的研究、商讨，也应当采取这种态度。因为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告诉我们，对于他们的学说不可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更不能“句句照搬”。他们对于当时历史事件的分析和所作的判断不可能句句都对。

商讨是重要的。但我认为目前更重要的是重新确立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和它对于中国革命事业的指导作用，并向人们作恰当的宣传。我们过去的宣传确有些毛病，有拔高的倾向，这几年又有某种贬低的倾向。目前我们确实是在从事一项“恢复毛泽东思想”的工作。我们的研究工作，首先要实现这一条。即使要商讨，也需要先把原著弄懂。不懂原著或者似懂非懂，是很难商讨的。近期以来，有些同毛泽东哲学著作商讨的文章，我看不能说已经把毛泽东哲学著作本身弄懂了。要弄懂，就得花一番功夫，要好好学习、研究。我以为这是我们目前首先要做事情。

要研究，就得讲究研究的方法。这方面，我想讲几点粗浅的意见，也算是希望吧。

第一，先不忙构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我不反对搞体系。任何称得上是一种学说的东西，都有它的体系，或者说，有它自身的一个系统。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毛泽东哲学思想

的体系如何摆，是否自成体系，有不同认识，可以讨论。但我以为，不能反对探讨体系。特别对于从事教学的同志，他们需要有一个教学大纲。这个东西，他们认为是体系也可以。我的意思是，体系这个东西，是从事大量研究的结果，不是研究开始时就能立即抓住的。凡是匆匆忙忙搞出来的，效果大抵不好。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首先还是要弄清这种哲学思想的方向。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向是什么呢？我以为，是密切联系实际，着重于应用，在应用中发挥和创造。这是中国革命条件和毛泽东同志个人的生活条件决定的。毛泽东同志从年轻时候起涉猎了许多书，积累了许多思想，也有从事著述的抱负，但他没有可能这样做，他很少有时间专门从学术上去从事批判和探讨原理、研究范畴。到延安以后有一点时间，他曾利用这点时间研究哲学，特别是现代哲学，甚至向中国哲学家李达同志、艾思奇同志等请教，但这样的时间也很少。他也没有大部头的哲学专著。和某些外国哲学家的庞大哲学体系比较起来，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大部头哲学著作比较起来，有些同志可能会从内心里感到惋惜和失望：短短的几篇著作，有什么可研究的呢？

的确，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思想，是有一些不同。我们现在叫做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中国条件下的运用和发挥，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概括，而又继承了中国哲学思维的传统。它的特点就是密切结合实际，并且从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作出概括。要看到这个特点。毛泽东真正可以说是一个实践的哲学家。我以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个方向，也应该是我们研究的方向。这就是说，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重在看它在实践中的应用。正如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集中见之于《资本论》一样，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论思想和辩证法思想，除了见之于他的专门哲学著作以外，大量的见之于他的论军事、论党的政

策和策略等著作中。我们现在提倡读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目的就在于要使人们懂得，毛泽东同志是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不能说我们对这些著作的研究已经卓有成效了。苏联人关于《资本论》中的辩证法思想还出了一点书，而我们对于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辩证法思想至今还没有写出一部有份量有影响的书来。

对毛泽东著作的哲学研究，可否考虑分多种方式进行，例如：（1）按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如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论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原则，研究他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研究他的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等等；（2）单篇研究。现在已开始这样做。我在这里特别提一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的哲学价值我们不能看小了。这篇文章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前导，它着重讲了矛盾的特殊性，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认识发展的两个阶段等重要问题。最近，我读到北京大学两位同志研究这著作的一篇文章，获益不少。当然这种研究还只是初步的。《论政策》一文（1940年作），全文不过五千六百字，讲辩证法的全面性讲得非常之好。《道德经》五千字，历来研究的人不少；《论政策》这样的著作至今还不见有人去研究。（3）分阶段进行研究。例如，研究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和文件。这个时期是中国革命的决战时期，斗争异常紧张和复杂。毛泽东同志这个时候虽然没有写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的哲学思想在实际中的运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4）作史的研究。有同志已经写出了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研究。

第二，要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要研究中国的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缺乏必要的中国革命史知识和党史知识，要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得出正确的结论，是困难的。可以举一个例子。最近有的同志研究《矛盾论》，认为《矛盾论》受苏联三十年代片面强调斗争性而轻视同一性的错误

倾向的影响，因此《矛盾论》的观点必然成为后来搞“斗争哲学”的一个思想原因。这种说法很明显的是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苏联三十年代确有片面强调斗争的倾向，政治上有，哲学上也有反映（例如，米丁等人一九三三年所写《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一书，就有这种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对中国党有没有影响呢？有的。这就是三十年代王明的左倾路线：在党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社会上各种政治力量搞“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王明的左倾路线来自苏联，来自共产国际。遵义会议后，党和毛泽东同志致力于肃清这种“一切斗争”的左倾政策，当然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方面的政策。《矛盾论》是反左倾之作，它同时反对“一切斗争”和“一切联合”两种片面性。它讲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就是这种两重性政策的哲学表现。如《矛盾论》说，“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① 它一方面指出，“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离开了同一性就无所谓斗争性；另一方面又说，“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②。至于斗争的绝对性和同一的相对性，乃是马克思主义明确提出的辩证法的不可动摇的原则，更不应把它混同于所谓“斗争哲学”，有意无意地动摇这一原则。可以说，象《矛盾论》这样展开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这两种相互依存的属性的关系，论述同一性在矛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过去还少有。而且，《矛盾论》提出的关于不同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的原理，关于斗争的绝对性和斗争形式相对性的原理，也是为了从思想上纠正片面强调斗争而不讲究斗争方法和策略的倾向提出来的。因此，《矛盾论》的主旨和苏联三十年代的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307页。

②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308页。

错误倾向恰恰是对立的。我们有的同志没有用心去研究党的历史，是他们对《矛盾论》作出不公正评价的重要原因，如果说不是主要原因的话（当然，我不是说，只要是搞党史的同志就一定能对《矛盾论》、《实践论》作出正确的评价）。现在，年轻同志大量涌入研究队伍，这是一个好现象，是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但上述现象也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有责任引导他们了解中国革命的昨天和今天。

第三，和“文化大革命”以前不同，我们现在研究毛泽东思想面临着一个特殊困难的问题，这在思想史上也是很少见的，就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在一系列问题上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当然也违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怎样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呢？我们在研究中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也回避不了这个问题。我以为，对待这个问题，要按照《决议》的精神，注意下述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严格区别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在认识上、在世界观上发生的失误。要理直气壮地讲清这一点。有人说，这种区别只有政治上的意义，没有科学上的意义，就是说，这种区别纯粹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实际上是讲不清的。这种说法当然是不对的。我们搞哲学工作的人，有责任分析清楚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可不可以这样看：整个或一般说来，毛泽东同志晚年在认识上发生的错误，并不象有些同志所说，是由于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包含有所谓“会导致唯心主义的种种因素”等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错误，包括后来他在世界观上的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他自己过去所着重阐明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原理，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例如，毛泽东思想关于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是实事求是，而毛泽东同志后来犯错误时则往往主观片面，显然，我们不能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又如，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

是马克思主义的杰作，但他后来犯错误时一度片面地主观地解释和应用实践，我们也必须把两者严格区别开来。总之，对于毛泽东同志晚年发生的错误，不能从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中去寻找原因（至于毛泽东著作中有个别在今天看来已不那么合适的提法，那是另一问题，这在马列著作中也在所难免，前面已经提到了），而主要应从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思想变化中寻找原因。当然，个人的变化也有某种社会历史原因和党的某种状况作为背景。作为个人，原来思想正确后来陷入谬误，是常有的事。任何一个理论家，即使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他一旦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主观片面地看问题，那末，他就会失去原来具有的正确认识事物的能力。这样的人当中，犯错误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有的人犯错误，是和他原来的思想或某些思想分不开的。普列汉诺夫可能是这样一个人物。普列汉诺夫虽然也批评了第二国际某些领袖（主要是伯恩施坦）的错误，但他自己整个说来并没有越出第二国际的思想体系，特别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这个问题上。他后来的错误，都和对这个问题的错误认识有关。有的人，原来思想是正确的，后来犯错误是由于违反了他自己原来的正确思想。毛泽东同志即属于这一类。特别要考虑到这样一个特殊情況（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我们所说的毛泽东思想，并不纯粹是某个人的思想，它同时是属于我们党的，如《决议》所指出，它是由党的集体智慧所创造和确定而具有一定客观内容的东西。因此，不能把毛泽东思想纯粹个人化。一个对于这种先进思想作出过主要贡献的人，后来一个时期离开了这一思想的轨道，但我们党的既成的先进思想本身并不因此失去它的光辉，这一点是不难解释清楚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分清事情的是非曲直之后，在区别清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之后，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毛泽东思想，就是说，它仍然是科学的真理，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研究毛泽东同志晚年在认识上是怎样失误的，为什么一个一生倡导实事求是并在反对主观主义中形成了自己特具风格的哲学思想的人，在晚年竟然在一系列问题上陷入了主观主义？有些失误还不应看作只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我们党也有份。这种研究是为了从中得出必要的经验教训来，特别要弄清楚正确是怎样转化为错误的，是在什么条件下转化为错误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有重大的认识论意义。在有了历史决议之后，我想这种研究不会太困难。但是，有一点应当注意：这种研究不是为了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真理性，或者引起人们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怀疑。这种研究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恢复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使人们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真理性获得进一步全面的认识。同时，对于我们研究者说来，还要为自己立一个高标准，就是把研究毛泽东同志晚年在认识上的失误和研究当前的新问题结合起来，并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尽可能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得到新的补充和发展。我们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想只要我们努力，是可以有些收获的。新的时代必然会造就出新的人材。我们不应当妄自菲薄。

第四，从目前已有的某些研究作品来看，我觉得还需要提一下：不可以孤立地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别的什么也不去研究，这样可能会把我们的研究搞得很贫乏。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也要涉猎中外各家哲学，特别是现代中国的哲学思想，要进行比较研究，这样才有可能使内容丰富，并且有可能向前推进这个哲学思想。举一个例子。研究《矛盾论》，碰到一个问题，就是第一性的东西和第二性的东西，本源的东西和派生的东西之间，一般说，前者起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但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意义上，一定范围内，后者也能起到决定性的反作用。这个问题正在讨论，这就是辩证法的相互作用的原理。弄清这个原理，才能弄清《矛盾论》

所提出的那个问题。黑格尔的《逻辑学》的本质论部分，最后着重讲这个原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话：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而这种相互作用常常通过因果关系表现出来。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就要加以研究。否则，《矛盾论》中提出的那个问题我们是争论不清楚的。